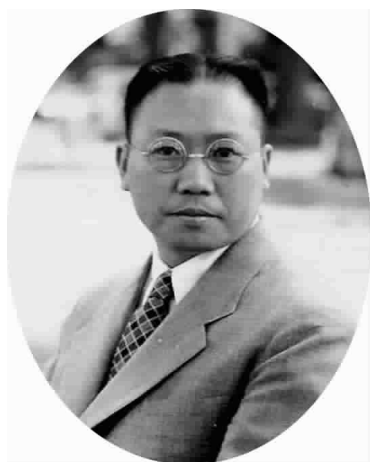


老实严谨的刘崇乐教授和他的遭遇

在美国康州的美弗尔的一所养老院里躺着一位华人老妇，她患有严重的老年痴呆，她几乎连自己的亲人包括自己的儿孙都不认识了。她 97 岁了，人世间的凄凉沧桑她都经历了，她太累了，也该休息了。养老院里的环境宁静清洁，护理的工作人员精心细致，退休的儿子每周都来看望她，四个孙子都已工作了，三位已成家，她已有重孙子重孙女。舒适的晚年生活，她也该安心了。她就是我称之为刘伯母的施慧元女士。她的先生就是我国著名昆虫学家，我国昆虫学创始人之一，原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一级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刘崇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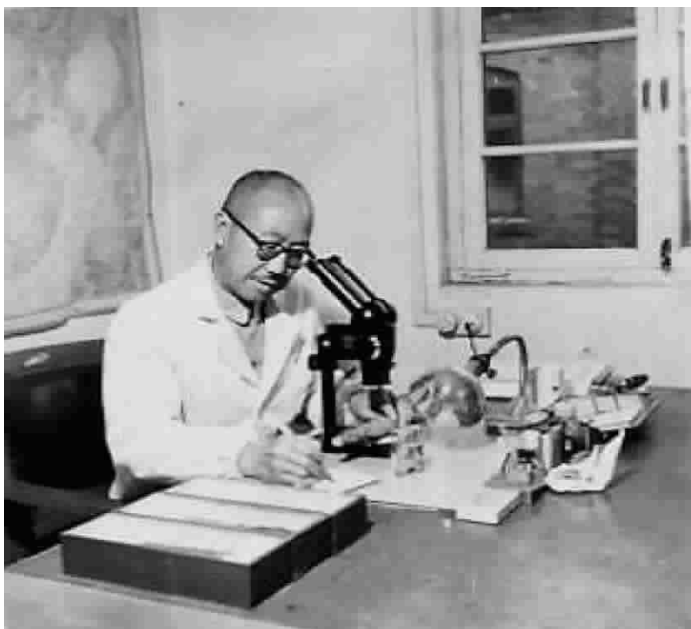
○ 刘崇乐(1901~1969)



○ 刘崇乐青年时代

刘伯伯是福建省福州市人，1901 年 9 月 20 日生于上海，1969 年 1 月 6 日卒于北京。他于 1920 年毕业于清华学校，1922 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学位，1922~1926 年在康奈尔大学攻读昆虫学并获得博士学位。1926 年返国后，历任清华大学生物系教授、东北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教授、清华大学农业院昆虫系主任以及北京农业大学昆虫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及该校昆虫研究所所长。新中国成立后，刘伯伯调至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动物研究所任室主任，曾任中国科学院昆明分院副院长，兼任昆

明动物研究所首任所长，昆虫学会理事和《昆虫学报》主编。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他长期从事生物学教学、生物防治、资源昆虫学和昆虫文献学研究，在昆虫学的人才培养及图书文献收藏方面都卓有建树，对我国资源昆虫特别是紫胶虫的调查、研究、利用及扩大新产区颇有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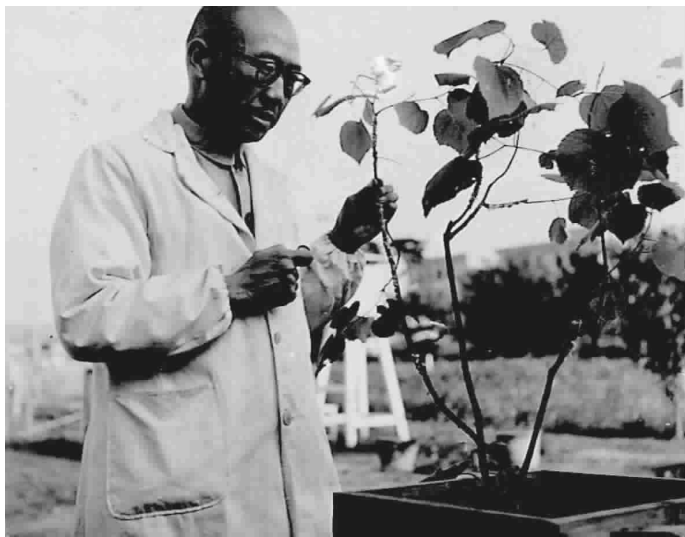


○ 刘崇乐在工作

刘伯伯是家父的同行和好友。1953 年家父从浙江大学调入北京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及至以后昆虫和动物二所合并成动物研究所以来，他们一直在一起共事，互相尊重、互相支持，直到 1966 年“文革”爆发。

刘伯伯一生热爱昆虫学研究。早期以胡蜂科为主要对象，中后期侧重于瓢虫科和寄生蜂、寄生蝇、蜘蛛的研究。他刻苦好学，知识渊博、精通外语，广收昆虫文献并极有研究。他学风严谨、做事认真，严于律己又诲人不倦，受到同仁的普遍敬重。有两件事可证明刘伯伯的做事为人。

1927 年 7 月，朱自清在清华园写下了著名散文《荷塘月色》。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树缝里也露着一两点路灯光，没精打采的，是瞌睡人的眼。这时候最热闹的，要数树上的蝉声与水里的蛙声……”30 年代，有一位陈姓的读



○ 刘崇乐在野外观察

者致函朱自清先生,认为“蝉子夜晚是不叫的”。朱自清便向周围的同事询问,出乎意料,同事大多同意那位读者的说法:蝉子晚上不叫。但似乎不够权威,朱先生便写信请教昆虫学家刘崇乐先生。刘先生大约也没有亲身经历,便翻阅多种有关昆虫的著作。几天后,他拿出一段书中的抄文,对朱自清说:“好不容易找到这一段!”抄出的这段文章说,平常夜晚,蝉子是不叫的,但在一个月夜,作者却清楚地听到它们在叫。

第二件事在1926年10月的秋季,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济在夏县西阴村发现了一颗花生壳似的黑褐色物体,这是一颗被割掉了一半的丝质茧壳,茧壳长约1.36厘米,茧幅约1.04厘米,已经部分腐蚀,但仍有光泽,而且茧壳的切割面极为平直。当时主持发掘的李济对此十分重视,但是在发掘现场再没有找到第二颗。围绕着半个蚕茧,李济请清华大学生物学教授刘崇乐进行鉴定。刘崇乐虽不敢断定这就是蚕茧,但也没有找出相反的证据。因为该茧壳比现在西阴村家养的蚕茧壳要小很多,不像是后来放进去的;因为埋藏的位置并不在坑底下,茧壳周围的土色也没有受干扰的痕迹;因为被利器切割过,该茧壳当然也不会是野蚕偶尔吐的。为此,刘崇乐初步断定其为桑蚕茧,切割面是由锐利的刀刃所为,并鉴定那半个蚕茧确是来自

于一种家蚕,因此证明了中国人在史前新石器时代已懂得养蚕抽丝。1928年李济重访美国时,又特意把这半个蚕茧的标本带去,求助华盛顿的史密森研究院,经那里的博物家帮助他鉴定出这个茧壳是属于家蚕的老祖先的茧壳,证实了刘崇乐的判断。李济在后来的很多学术论著中,都提到过“半个蚕茧”这件事,提法一直比较谨慎,只是作了几点推论,提出了思考方向,并未作肯定的结论。

从这两件事可看出刘伯伯作为一个科学家的严谨态度,而不像当今中国有些人搞学术腐败,弄虚作假,欺世盗名。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作为一个科学家首先要老老实实做人、做学问。

刘伯伯离开我们快40年了,在其一生的教育、科研生涯中,著述甚丰。在中外刊物发表论文53篇,撰写学术专著6部,译著2部。他的为人,他的杰出贡献,他的遭遇,他的死,能不让我们后人深刻反思吗?

* 本文完稿时接到刘彰业的电话,他母亲已于二周前在养老院平静地去世。安息吧,刘伯母。

竺可桢——父亲的良师益友

现在,见过竺可桢先生并亲自聆听过他教诲的人已经不多了。我是有幸的其中一位。在湄潭、杭州期间,因年幼没有太多印象。但家父蔡邦华调北京中国科学院后,每年过年过节,家父总带我们去中国科学院第一宿舍拜访竺可桢先生和相邻的吴有训先生。除“文革”期间有几次没能去之外,至少带我去七八次吧!记得最后一次见到竺伯伯是1973年春节,我清晰地记得,他拿出一篇刚完成的论文《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写下“邦华先



○ 竺可桢(1940年5月)



○ 竺可桢(1973年1月)

生,请批评指正!”亲手交在父亲的手里。当我看到这个题目时给了我极大的震撼,好大气魄的研究课题。在回家路上,爸爸跟我讲,竺先生长期养成记日记习惯,历年勤记不辍,无论在兵荒马乱的年代还是自身的疾病变故,都没有间断过。日记中还记载了每天的天气和气候。这是我第一次听说竺可桢有记日记的习惯。

竺可桢先生 1890 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上虞东关镇,是我国现代气象学和地理学的一代宗师。他于 1918 年获得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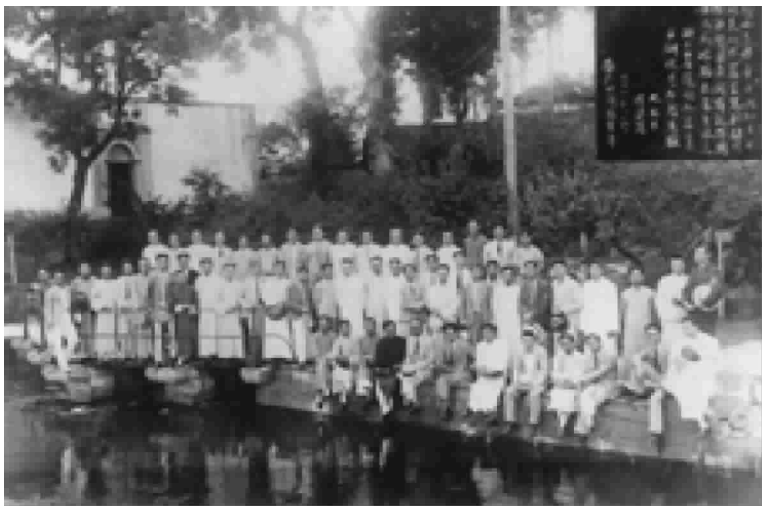
佛大学博士学位,生前曾长期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他比家父年长 12 岁,他们相识、相交和相知在浙江大学,保持了几十年的友情。家父对竺师的知遇之情是不能用语言表达的,父亲一直把竺可桢先生当成他的良师益友。

家父 1928 年到浙大任教,比竺先生早到浙大。1933 年,郭任远任浙江大学校长,在学校推行党化教育,执行“大学军队化”的方针,对教职员盛气凌人,时有侮蔑凌辱,令家父十分反感。当时,国民党头目陈果夫要求在浙江大学农学院设一个“火腿系”,农学院院长许璇认为这是干涉学校工作,不予理睬。陈果夫又通过郭任远对农学院施加压力,许院长愤然辞职。郭任远转而委派森林学系主任梁希继任院长,而梁希却同情老友许璇立场,不满意郭任远排挤为人正直的许璇,断然拒绝出任院长,并提出辞职。由此引起公愤,家父与同院 58 位教师群起支援,一起辞职,离开浙大。这成为当年农学界的一件大事。而后,郭任远种种倒行逆施又形成浙大师生的一场旷日持久的驱郭风潮。为了平息家乡的学潮,蒋介石要物色一位有声望、有学术成就的大学校长来执掌浙大,众望所归的浙籍科学家竺可桢被选中。

1936 年 4 月 25 日,竺可桢开始执掌浙大。竺可桢一改郭任远的作风,

决定废止军事化的管理制度,学习西方先进的教育经验,实施自由民主的办校方针,主张学术自由、思想自由、教授治教。他开始在国内外千方百计网罗人才,凡有真才实学的学者,竺可桢都要想办法请来学校执教。对于在海外留学归来有才华的学子,不问是国内哪个学校毕业,竺可桢都委以重任——年仅28岁的谈家桢、26岁的吴征铠都被聘为教授;竺在哈佛大学、东南大学和中央气象所共事的许多同学、同事和学生,均被竺邀请至浙大办学,但对东南大学的同事竺也并无门户之分,来自东南大学的农学院院长吴福桢为扩大农学院其他系决定停办森林学系,此举让森林学系师生大为不满,其他系师生也为森林学系抱不平,遂改由与竺素昧平生的卢守耕任农学院院长;1937年家父到杭州任浙江省昆虫局局长,竺可桢邀请他再回浙大,父亲被竺的诚意所感动,回到了农学院任教……

○反对郭任远,
农学院58位教
职工愤然离校。
这是离校前在
杭州西湖放鹤
亭的合影(1933
年6月)



当时正逢日本侵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战火迅即扩散到全国。杭州频遭空袭,为安定科研学习环境,浙大不得不西迁。浙大首迁浙江建德、继迁江西吉安与泰和、三迁到广西宜山时,日军18架飞机在浙大的临时校舍投下118枚炸弹。由于战局紧张,对于学校何去何从一时众说纷纭;加上缺医少药、疾病流行,我的一个姐姐因百日咳被夺去了生命,家父经丧女之痛后决定接受云南大学的邀请,准备去昆明,行李都装上汽车了,竺可桢校长得知

后竭力挽留并果断决定,任命当时年仅 37 岁的家父为农学院院长。父亲再一次为竺可桢校长的诚意所感动。此自开始了长达 13 年的浙大农学院院长的生涯。竺可桢担任了浙江大学 13 年的校长,家父在他直接领导下与之整整合作了 10 年,其中包括浙大西迁遵义、湄潭的黔北办学的六年半。解放后,竺可桢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并兼生物地学部主任,1953 年家父调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后合并成动物研究所,也一直在竺先生的领导之下,直至他于 1974 年 2 月 7 日去世。

竺可桢先生对家父委以重任,充分信任。1939 年在宜山,他授命家父为西迁先遣队负责人,前往贵州选址,家父回宜山后,提出校址设在遵义的方案。竺校长将此方案提交校务会议讨论后,最终同意并在湄潭设立分部。浙大从宜山迁往贵州时,是由文理学院、工学院和农学院三学院组成的。当时,家父和工学院院长王国松都正年富力强,文理学院院长梅光迪(文)和胡刚复(理)的年龄比较大,所以学校很多具体事务遵义部分由王国松负责、湄潭则由家父去完成。当时的教务长张绍忠也为浙大黔北办学作出重要贡献。竺校长之所以能把浙大办成第一流的学校,除了他的办学思想外,也得益于他在管理上采用分工协作、各负其责、重大事务再由校务会议决定的合理方式。在湄潭办校过程中,家父在农学院有职有权,和竺校长办学理念相合,他坚决贯彻竺校长反复强调办好大学有三个关键要素:教授、图书仪器和校舍建筑。而在这三者之中,“教授是大学的灵魂”。如同竺校长一样,他大力延揽一流学者、教授。在湄潭农学院任教、讲学的专业教授达 42 名,各系均有知名的教授、学者——如农学系的卢守耕、孙逢吉、徐涉,园艺系的吴耕民、熊同和、邵均(森林),农业化学系的杨守珍、彭谦、罗登义,病虫害系的蔡邦华、陈鸿逵、柳支英、刘淦芝、祝汝佐,农业经济系的梁庆椿、吴文晖,蚕桑系的夏振铎、王福山等。此外,生物系的贝时璋、罗宗洛、谈家桢、仲崇信、张肇骞等均为国内的知名教授学者,在农学院讲授动物学、植物学、遗传学、植物生理学、细胞学等学科,对提高教学质量起到很大的作用。

当时,农学院院部、教室、图书馆设在文庙,学生宿舍在梵天宫(后迁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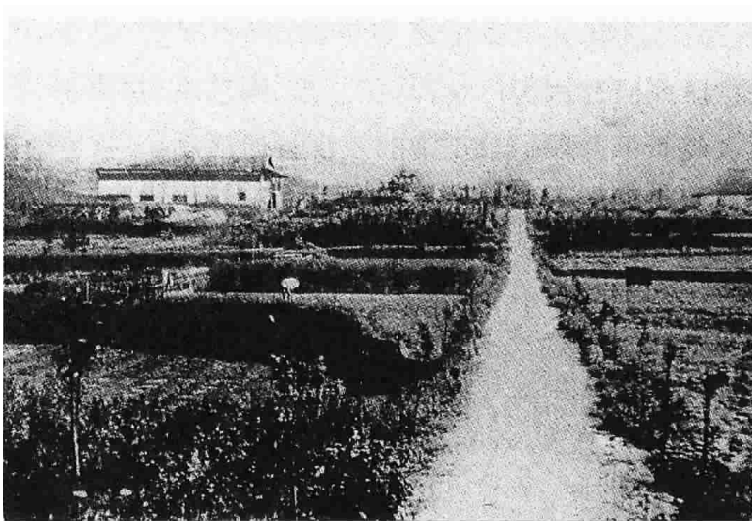


○ 浙江大学农学院师生在湄潭(前排左二为蔡邦华)

新宿舍),农经系在财神庙。学院在西门外约1公里的遵义公路旁,湄江之滨,牛郎背下,贺家祠堂四周租地200余亩辟为农场。贺家祠堂设农艺系、园艺系;蚕桑系设在祠堂外的侧屋。在贺家祠堂附近高地上,新建起一座二层木结构的“病虫大楼”——这是农学院最漂亮的建筑,属病虫害系,除教师工作室外,尚有病、虫大实验室(各一间,每间可容纳30人)、仪器药品室、图书资料室、昆虫标本室、植病标本室和消毒室等。屋前还建有小型养虫室和小温床以供教学科研之用。该楼南面隔江面向“牛郎背”山坡;北面是园艺场的花园和菜圃。每年除冬季外,色彩缤纷的各种鲜花相继盛开,红黄茄果与绿叶相映成趣,是一个优美的读书环境。在农场东北侧的禹王宫为农化系。北侧与农场大门隔路相对的唐家祠堂设生物系。这里形成浙大生物科学的活动中心。当时课堂分散在城内文庙等处,农学院学生上午大多在城内听课,下午到城外实验室或农场进行实验和实习,满城往返,湄潭成了一座大学城^①。

竺可桢先生爱校如家、爱护教授、爱生如子,这种情怀深深地感染着父亲。在那个年代,竺校长以爱护学生和教授为天职,这也是现代大学管理的理念之一。竺校长全然不把大学校长当一个官员来做,他决策什么事情,往

^① 浙江大学农学院在湄潭。



○ 贵州湄潭浙
江大学农学院
农场一角

往先会在思想情感方面和教授、学生进行沟通。所以每当教授和学生出事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不是去责怪教授和学生，而是先去解脱他们，使他们免于任何迫害。

家父平时较严肃，学生也许有些怕他。家父对于学生的政治兴趣和政治选择可能并不苟同，有时也会劝劝学生，希望学生能够集中精力学习。但他富有正义感，在遇到大事的时候，会挺身而出保护学生。如1942年农学院学生滕维藻、助教潘家苏遭人陷害被捕，竺校长让父亲代表校方前往交涉、设法营救。经家父努力斡旋，二人终获保释。又如1947年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农学院学生于子三被害，整个“于子三事件”中竺校长都将家父作为处理事件的主要助手。他委托家父和校医李天助，去现场调查。后浙大遭军警包围，打手冲进校园，捣毁学校，又让家父立即赶赴南京，代他向教育部长朱家骅请辞校长之职。家父不顾个人安危翻墙而出，连夜乘京杭直达赶往南京。车上遇《大公报》记者，于是把浙大遭受暴行的情况叙说了一遍。记者问：“可否在报上发表？”家父说：“可以发表，但不要署我名字。”次日（1948年1月5日），《大公报》、《申报》将浙大“一四暴行”的消息传遍全国。在面见朱家骅时，朱劈头责问：“于子三是千真万确的共产党，你们还要为他说话？”家父回答：“于子三是农学院的好学生，我是农学院院



○ 湄潭浙江大学宿舍之一

长,不能不为他哀悼。”父亲陈述学校被军警包围、歹徒破坏,目前搞得无法生活、无法教学,竺可桢校长前来辞职,并向教育部请示善后。家父回杭后,向竺校长汇报经过。竺立即要他暂勿外出,因为省政府已派人查问:“《大公报》消息是否蔡邦华发出的?”竺校长回答说:“不知道,但报上所载,完全是事实。”^①

竺可桢先生在政权交接之际,离开浙大,家父不得不代他临时接管校务,处理竺校长离开后的校务工作。在那个年代,很多教授是不愿意兼任行政工作的,家父也是更愿意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但竺校长的知遇之恩,使他为浙大倾注了全部心血,而且将他人生中最美好的岁月奉献给了浙大。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由教育部和华东军政委员会做出拆分浙大的决定。此时,家父遭人诬陷,遇到不公正对待。也正是在此时,家父被调往中国科学院昆虫所任副所长。此中是否有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竺先生的苦心,我不得而知。

“文革”期间,为浙大的事,家父再度遭受冲击,硬说浙大应变会是“反动组织”。造反派把家父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反动政客”,关押在

^① 《竺可桢全集》第八、九、十、十一卷。



○竺可桢(右一)、蔡邦华(右七)与浙大部分教授在一起(1948年)

立者右起:藕舫(竺可桢),劲夫(王国松,工学院院长),鲁珍(沈思珩,地理教授),今英(李今英,梅光迪夫人,外文系教授),子桐(陆子桐),邦华(蔡邦华,农学院院长),家桢(谈家桢),季梁(王璉),祥治(孙祥治),季恒(孙恒),均一(吴定良),晓峰(张其昀,文学院院长、史地系主任),伯豪(董伯豪,英语教授),善培(朱正元,物理学教授),傲南(顾谷宜,历史学教授),其楷(张其楷),浩培(李浩培,法学院院长),耀德(杨耀德,电机教授),步青(苏步青),时璋(贝时璋),允敏(陈汲,竺可桢夫人),仲翔(朱庭祐,地质学教授);前蹲右起:静波(杨其泳),厚信(舒鸿,体育教授),坤珊(余坤珊,外文系主任),觉予(谢家玉,总务长)。

动物所“牛棚”,把我从15楼赶到30楼一间8平方米房间里。我弟弟经受不住“文革”风暴的冲击,被逼成精神病。家父晚年不得不为他的幼子的不幸遭遇承受精神的折磨和操劳。我弟弟本天资聪颖,从北大附小一直到北大附中,年年成绩优异,屡获金质奖章。他没能上大学,但曾写过一本书,被日本、韩国学者译成日文和韩文,现在在网络书店上仍可查到,在“Google”上搜索“蔡恒息”可获36条条目,多为日文和韩文的链接。

原来就是谦谦君子的竺可桢在“文革”中谨慎小心多了,本着“求是”精神,他对这场莫名其妙的政治运动深深反感。夫人去跳“忠字舞”了,竺可桢

不得不亲操炊务；有病住进北大医院，也要“早请示晚汇报”，一次，我和家父在公共汽车上碰上竺伯伯，他告诉爸爸为浙大之事，他接受了上百批次的外调来访。他在《竺可桢日记》中愤愤说：“这样对待高级知识分子，实在过分了。”他曾掌领的浙大，“旧时人员 300 多都集中在六和塔（分校）学习数月”。前校长痛苦地写道：“有许多是要打倒的。”教育家郑晓沧“告老”不准；孟宪承死后家属被逼迁居，交出存款；苏步青被罚跪；谈家桢妻自杀；谷超豪——前浙大引以为豪的学生——却成了复旦开辟专搞科学而不以政治挂帅的“谷超豪道路”的“白专”典型；常书鸿，以日记得祸，“把他脊骨敲断”……

科学院各研究所的人，施雅风、刘东生、潘菽、童弟周、曾呈奎、张玺、蔡邦华、刘崇乐、柳大纲、曹天钦、赵忠尧、钱人元、陶愉生、熊庆来、杨钟键、裴文中、黄汲清、钱三强、何泽慧、赵九章以及叶君健、吴世昌等等，他们的遭遇都记在竺可桢哀痛的笔下。

在科学受到糟践的年代，竺可桢黯然神伤。他没有被打倒，却是一个“被审查对象”。他是副院长，早已失去了过问科研决策的权力和亲自考察的机会。竺可桢曾为“科学家”这个神圣的称谓立下三种操守和尺度——虚怀若谷，不武断蛮横，不凭主观，不抱成见；实事求是，专心一致，不作无病呻吟，严谨整饬，毫不苟且，不盲从附和，一切以理智为依归；如遇逆境，不屈不挠，不畏强御，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他是不愧“科学家”这个称号的。一向主张学术独立、教育独立的竺可桢曾竭尽全力排除政治的干扰，维护学术和教育的尊严。在现代中国的急风骤雨中，他以自己的人格、理想和才干为浙大营造了相对安定的学术、教育氛围，吸引了许多一流学者、教授。在浙大的发展历程中，从 1936 年到 1949 年担任校长达 13 年之久的竺可桢先生可谓居功至伟，被公认为浙大学术事业的奠基人、浙大“求是”精神的典范、浙大的灵魂。

中国生物学的一代宗师秉志先生

家父生前常讲起生物学界的几位前辈，其中一位是动物学家秉志，他是